

中國史學名著選
鄭天挺主編

三國志選

本冊編注者 繆 鉞

三國志選

中華書局

本書供高等學校歷史系學生使用

三 國 志 選

繆 鉞 編注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0¹/₈ 印張·191 千字

1962 年 12 月第 1 版 1980 年 3 月第 7 次印刷

印數：121,981—171,980 冊

統一書號：K11018·386 定價：1.00 元

「中國史學名著選」前言

中國史學名著選是爲高等學校歷史專業課程史學名著選讀編選的。目的在通過選本訓練學生閱讀古典歷史文獻的能力，並畧知我國古代著名歷史著作的各種體裁和基本內容。

本書先編選左傳、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資治通鑑六種選本，分冊印行。體例不要求一致。或按年代先後，或按原著卷帙次第，或按問題性質分類，編次成書。

選本重點選錄名著的代表作品，包括它所反映的這一特定時期的主要典章制度、重大歷史事件、傑出人物的活動、科學技術的發明與發現、文化思想的流派和民族關係等內容，以及著者的歷史觀點。

選本作必要的簡單注釋，舊注可用的盡量採用。三國志裴松之注全錄，通鑑胡三省注除反切外全錄。

選本盡可能採用最新整理出版的標點本，沒有新標點本的選用較好版本，必要時附加校勘記。

選本對於選錄的名著都作了說明，簡單介紹它的內容、體例、寫作經過和通行版本，以及著者的生平、重要著述和學術影響，並說明選本的選錄原則。

鄭天挺
一九六二年八月

說明

三國志的作者陳壽，字承祚，巴西郡安漢縣（四川南充市）人。生於蜀漢後主建興十一年癸丑（二三三），卒於晉惠帝元康七年丁巳（二九七），年六十五歲。

陳壽少時受學於同郡史學家譙周，「聰警敏識，屬文富豔。」（華陽國志卷十一陳壽傳）在蜀漢王朝，陳壽出仕爲東觀祕書郎、散騎黃門侍郎。「」當時宦者黃皓專權，許多朝臣都諂附他，陳壽獨不然，所以屢被譴黜。

二六三年，蜀漢爲曹魏所滅，這時陳壽三十一歲。兩年之後，司馬炎奪取曹魏政權，建立晉王朝，是爲晉武帝。陳壽居父喪時，有病，使侍婢調治藥丸，當時人認爲這件事情觸犯封建禮教，加以貶責，沈廢累年。後來張華欣賞陳壽的才學，加以揄揚，於是陳壽被舉爲孝廉，作佐著作郎，出補平陽侯相。「」陳壽爲佐著作郎時，曾受中書監荀勗、中書令和嶠的委託，定諸葛亮故事。晉武帝泰始十年（二七四），陳壽在平陽侯相任上，撰成諸葛亮集二十

四篇，奏於朝廷。不久，即遷著作郎。陳壽爲佐著作郎及著作郎時，都兼領本郡中正。^{〔三〕}

二八〇年，晉滅吳。自漢末以來，分崩離析，三國鼎峙，前後約九十年，至此復歸統一。這時陳壽四十八歲，他開始整理三國史事，著魏、蜀、吳書共六十五篇，稱爲三國志。張華看到這部書，很欣賞，薦舉陳壽爲中書郎。權臣荀勗嫉妬張華，因此也不喜歡陳壽，授意吏部遷陳壽爲長廣太守。陳壽以母老爲藉口，辭官不就。鎮南大將軍杜預表薦陳壽爲散騎侍郎，朝廷任命他爲治書侍御史，後來因母死丁憂去職。他母親臨死時，遺言葬於洛陽，陳壽遵照辦理。當時清議認爲陳壽不以母喪歸葬於蜀中故鄉是不對的，於是又受到貶責。數年之後，起爲太子中庶子。還沒有就職，就病死了。西晉時代，朝政腐敗，權貴恣肆，陳壽終身仕宦是不得志的，所以華陽國志陳壽傳說：「位望不充其才，當時冤之。」

二

陳壽在譙周的影響之下，從少年時代起，就喜歡讀古代歷史名著如尚書、春秋三傳、史記、漢書等，研究撰寫史書的方法、義例、別裁、通識。後來他自己寫史書，先從地方史做起。自東漢初以來，蜀郡鄭伯邑、趙彥信、漢中陳申伯、祝元靈、廣漢王文表等，都留心鄉邦人物，作巴蜀耆舊傳。陳壽認爲他們的著作還有不足之處，於是撰益部耆舊傳〔四〕十篇。此

外，他又撰古國志五十篇，而最精心結撰的則是三國志。益部耆舊傳與古國志都亡佚了，只有三國志流傳下來。

在陳壽撰著三國志之前，魏、吳兩國都有官修的史書，如王沈魏書、韋昭吳書，又有魚豢魏略，是私家撰述，這些都是陳壽所參考、依據的資料。當然，除此之外，陳壽還可能多方採訪。至於蜀漢，因為未置史官，無有撰述，^{〔五〕}所以蜀漢史事，更有賴於陳壽的殷勤搜集。陳壽原是蜀人，對於故國文獻，向來留意，在撰著三國志之前，曾奉命定諸葛亮故事，所以是具備其有利條件的。三國志撰成後，當時見到稿本的人都很讚賞，「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張華比之於司馬遷、班固，並且對陳壽說：「當以晉書相付耳。」夏侯湛正在撰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書而罷」。陳壽死後，梁州大中正尚書郎范頴等上表說：「臣等按，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採錄。」於是朝廷命令河南尹、洛陽令派人到陳壽家中抄寫這部書，藏於政府（以上引文均見晉書陳壽傳）。

陳壽的三國志，就大體說來，超出於其他諸家關於魏、蜀、吳三國史事的撰著，後人對它評價頗高。劉勰文心雕龍史傳篇說：「及魏代三雄，記傳互出，陽秋、魏略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徵，或疎闊寡要，唯陳壽三志，文質辨洽，荀、張比之遷、固，非妄譽也。」但

是其中也有一些問題，引起後人的批評與責難。

第一個是關於陳壽修史態度的問題。晉書陳壽傳在肯定三國志的價值之後，又記載了兩件事，說明陳壽修史態度有時不公平：

或云：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爲立傳。壽父爲馬謖參軍，謖爲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爲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

封建史家由於階級立場和時代的限制，對於歷史人物的評價，歷史事件的分析，當然不能做到真正公允。但是這兩件事是否可靠呢？古代學者中是有人相信這個說法的。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四三國志條，評價三國志時，就這樣說：「乞米作佳傳，以私憾毀諸葛亮父子，難乎免物議矣。」但是也有一些學者，如清代的朱彝尊、杭世駿、王鳴盛、趙翼等，爲陳壽辯護。王鳴盛綜合朱彝尊、杭世駿二人的意見，認爲陳壽對於魏朝文士，只爲王粲、衛覬等五人立傳，至於徐幹、陳琳、阮瑀、應瑒、劉楨，僅於王粲傳中附書；今王粲傳附書云：「沛國丁儀、丁廙、弘農楊修、河內荀緯等，亦有文采。」又於劉廙傳附見云：「與丁儀共論刑禮。」這樣已經够了，何必還要更立專傳呢？況且丁儀、丁廙兄弟並非好人，王沈魏書、魚豢

魏略都記載他們的壞事，這種人當然不能再立佳傳，並不是陳壽因索米不得而故意抑之。關於街亭之敗，陳壽直書馬謖違背諸葛亮的節度，爲張郃所破，並未嘗以私怨而歸咎於諸葛亮；至於論諸葛亮將略非其所長，則張儼、袁準都曾這樣說過，也不是陳壽一人之私言。王鳴盛同意朱、杭二人之說，又補充說：陳壽入晉之後，撰次諸葛亮集，作表奏上，推許甚至，在諸葛亮傳中，特附亮集目錄，並所上書表，以表示尊崇，傳後評語反覆稱讚他的刑賞之當，都足以說明陳壽在論述諸葛亮時是很推崇的，並沒有因爲其父坐罪懷私怨而貶抑諸葛亮之處（十七史商榷卷三十九陳壽史皆實錄條）。趙翼廿二史劄記卷六陳壽論諸葛亮條，也舉出許多例證，說明陳壽對諸葛亮推崇備至，所謂因父被髡而於諸葛亮有貶詞者，乃無識之論。以上這些辨析，都很明確，可見晉書陳壽傳所記的這兩件事都是不足信的。

其次，後人對於三國志責難最多者，是以魏爲正統一事。陳壽修三國志，是以魏爲正統的。書中對於魏國的君主如曹操（曹丕建立魏朝後，追尊曹操爲武皇帝）、曹丕、曹叅等，都列爲武帝、文帝、明帝諸紀，而對於蜀漢與吳的君主如劉備、孫權等，則立爲傳。在魏書中，對於劉備稱帝孫權稱帝之事皆不書；而在蜀書、吳書中，於君主卽位，必記明魏之年號，以見正統之在魏。東晉習鑿齒作漢晉春秋，開始提出異議，主張以蜀漢爲正統。南宋朱熹以後，都贊同習鑿齒而非難陳壽。關於此問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三國志條有一段解

釋：

以理而論，壽之謬萬萬無辭；以勢而論，則鑿齒帝漢順而易，壽欲帝漢逆而難。蓋鑿齒時晉已南渡，其事有類乎蜀，爲偏安者爭正統，此孚於當代之論者也；壽則身爲晉武之臣，而晉武承魏之統，僞魏是僞晉矣，其能行於當代哉！此猶宋太祖篡立近於魏，而北漢、南唐蹟近於蜀，故北宋諸儒皆有所避而不僞魏；高宗以後，偏安江左，近於蜀，而中原魏地全入於金，故南宋諸儒乃紛紛起而帝蜀。此皆當論其世，未可以一格繩也。

這個解釋相當明白。所謂「正統」之說，完全是爲封建統治服務的，其是非標準，以對當時的封建統治是否有利爲權衡。西晉承魏，北宋承周，建都於中原，所以當時封建史家都以魏爲正統；東晉與南宋都是偏安江南，情況與蜀漢相似，所以當時封建史家又都以蜀漢爲正統。陳壽修三國志，以魏爲正統，這正是封建史家照例的作法。這種是非的爭論，在我們今日看來，是毫無意義的。

另一種對三國志的批評，是說書中時有曲筆，多所迴護，換句話說，就是替封建統治者（尤其是西晉的統治者）隱惡溢美。史通卷七直書篇：「當宣、景開基之始，曹、馬構紛之際，或列營渭曲，見屈武侯，或發仗雲臺，取傷成濟，陳壽、王隱，咸杜口而無言。」趙翼廿二

史記卷六三國志多迴護條舉出許多例證。譬如魏齊王芳之被廢，是司馬師的主張，事前太后並不知道，而齊王芳紀反載太后之令，極言齊王芳無道不孝，以見其當廢；高貴鄉公親自率兵討司馬昭，爲司馬昭之黨成濟所殺，乃高貴鄉公紀但書「高貴鄉公卒」，絕不見被殺之迹，反載太后之令，言高貴鄉公悖逆不道，自陷大禍，欲以庶人禮葬之；敘魏與蜀戰，常是諱敗誇勝；劉放、孫資本是奸邪之人，而陳壽作二人合傳，說他們身在近密，每因羣臣諫諍，多扶贊其義，並時陳損益，不專導諛言，大概因爲孫、劉二人有功於西晉統治者司馬氏，司馬氏感激他們，所以陳壽爲二人作佳傳。由劉知幾、趙翼所舉的例證，可以看出陳壽爲西晉統治者迴護是很明顯的。本來封建史書都是爲封建統治服務的，不過，封建史家的思想有進步與落後的不同，因此對封建統治者的態度也不完全一樣。有進步性思想的封建史家，能在一定的程度上揭露封建統治的黑暗，或據事直書，或微辭諷刺，司馬遷史記之所以比較高明，這也是很重要的一點。陳壽三國志在這方面是有遜色的。

以上所舉，是歷來學者對於三國志幾點重要的批評。其中索米不遂而不爲丁儀兄弟立傳及因父受刑而貶抑諸葛亮的兩種傳說，都是不可靠的。至於以魏爲正統，乃是西晉封建史家所不得不如此做的，而且所謂「正統」的是非，我們今日也不必去管它。惟獨書中時有曲筆，替西晉統治者隱惡溢美，多所迴護，這的確是三國志的缺點。

陳壽修三國志，爲了維護當時統治者司馬氏的利益，作了不少的曲筆，但是對於曹魏與孫吳刑政的苛虐、徭役的繁重，却沒有什麼掩飾；同時，其他許多史事的敘述，也都是「剪裁斟酌處，亦自有下筆不苟者，參訂他書，而後知其矜慎」（趙翼廿二史劄記卷六三國志書事得實條）。茲以諸葛亮傳爲例，加以說明。關於諸葛亮的史料，文獻記載與口頭傳說都相當的豐富。陳壽作諸葛亮傳時，在史料的取捨上，是經過審慎斟酌的。關於劉備與諸葛亮最初相識的經過，魏略與九州春秋都說是諸葛亮自己去見劉備的（三國志諸葛亮傳裴注引），陳壽不取此說，而根據諸葛亮出師表中的自述：「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所以記此事時說：「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諸葛亮征南中事，當時傳說不免有誇大溢美之處，譬如對於孟獲的七擒七縱，是不合情理的，所謂「南人不復反」，也是不合事實的（後來東晉習鑿齒作漢晉春秋，採錄了這些事）。陳壽一概不取，只說：「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當時又有一種傳說：「諸葛亮於建興五年北伐時屯於陽平，遣大軍東出，司馬懿率二十萬人徑至城下，城中兵少力弱，將士失色，莫知所出。諸葛亮意氣自若，勅軍中臥旗息鼓，大開城門。司馬懿疑有伏兵，引軍北去。西晉人郭沖說諸葛亮五事，此爲其一（見裴注引王隱蜀記）。這個傳說既不合事實，也不合情理。蜀漢後主建興五年卽是魏明帝太和元年，這時司馬懿爲荊州都督，鎮宛城，並未在關中抗禦諸葛

亮，況且司馬懿也是對於軍事很有經驗的人，不至於這樣幼稚可欺。所以陳壽對此事屏棄不取。諸葛亮後出師表載於吳人張儼默記中，就這篇文中的思想與所敘事實看來，都不像是諸葛亮的作品，可能是張儼擬作的（清人袁枚、黃以周都曾作文辨析）。陳壽作諸葛亮傳，不錄此篇，是有道理的。從以上所舉諸事例，都足以看出陳壽對於史料的取捨選擇，比較謹嚴矜慎。他雖然崇拜諸葛亮，但是對於有些傳說將諸葛亮誇飾得過於神奇者，他都不採用。

陳壽所作諸傳，照顧的方面很廣。凡是三國時期在政治、經濟、軍事上有關係的人物，以及在學術思想、文學、藝術、科學技術上有貢獻者，都根據具體情況，或立專傳，或用附見。不過，也不免偶有遺漏。譬如華佗與張仲景都是建安中的名醫，陳壽爲華佗立傳而忽略了張仲景，史通人物篇已指出這一點，認爲是陳壽的「網漏吞舟」。又如馬鈞是當時「天下之名巧」，陳壽也沒有給他立傳。

三國志只有紀、傳而沒有志，似乎也是一個缺陷。志是比較難作的，江淹認爲：「史之所難，無出於志。」（史通正史篇）陳壽大概是因爲資料搜集的不够，所以沒有作志。

三國志通體簡約爽潔，無繁冗蕪雜之弊，各傳中所選錄的文章，也都能擇取最重要者，大都有歷史意義，或兼有文學價值，不像王沈魏書、魚豢魏略選錄文章過多，有「穢累」之弊。

（史通載文篇）。至於陳壽的文章，亦以簡潔見長，而對於歷史人物的描寫，在生動傳神方面，則不如司馬遷的史記，亦不如班固的漢書。葉適說：「陳壽筆高處逼司馬遷，方之班固，但少文義緣飾爾，要終勝固也。」（文獻通考卷一百九十一經籍考三國志條引）未免稱讚過高。李慈銘說：「承祚固稱良史，然其意務簡潔，故裁制有餘，文采不足；當時人物，不減秦漢之際，乃子長作史記，聲色百倍，承祚此書，闕然無華，范蔚宗後漢書較為勝矣。」（越縕堂日記咸豐己未二月初三日）這個衡量是分寸恰當的。

三

在陳壽作三國志後約一百三十餘年，劉宋文帝命裴松之爲三國志作注。

裴松之（三七二——四五二）字世期，河東聞喜（今山西聞喜縣）人，他的祖父裴昧已經遷居江南。裴松之「博覽墳籍，立身簡素」。宋初，官中書侍郎。他奉命作三國志注，即「鳩集傳記，增廣異聞」，書成，於元嘉六年（四二九）奏上。宋文帝很欣賞，說：「此爲不朽矣。」（以上引文均見宋書裴松之傳）

裴松之上三國志注表中說：

壽書銓敘可觀，事多審正。……然失在于略，時有所脫漏。臣奉旨尋詳，務在周

悉，上搜舊聞，傍撫遺逸。……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

可見裴注體例，不在於訓詁、名物、制度的解釋，而在於史料的補闕與糾謬。雖然後來有些學者認為裴注失於繁蕪，譬如劉知幾說：裴注「喜聚異同，不加刊定，恣其擊難，坐長煩蕪」（史通補注篇）。陳振孫也說：三國志「本書固率略，而注又繁蕪」（直齋書錄解題卷四三國志條）。葉適認為：「注之所載，皆壽書之棄餘。」（文獻通考卷一百九十一經籍考三國志條引）但是這些批評並不全都恰當，尤其葉適的說法更是錯的。裴注所引史料，其中大部分是陳壽同時或以後的人的著作，從各方面搜得的史料，並非都是陳壽所能見到的，怎麼能說是「皆壽書之棄餘」呢？

裴注搜採廣博，引書一百四十餘種，其與史家無涉者尙不在數內（據錢大昕的統計，見廿二史考異卷十五）。其中有百分之九十幾早已亡佚了，賴裴注徵引，尙可見其崖略；並且裴注引書，首尾完具，不加以剪裁割裂，尤便於讀者參考。所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考證之家，取材不竭，轉相引據者，反多於陳壽本書焉。」（本書卷四十五三國志條）我們今天讀三國志，必須讀裴注，研究三國時期的歷史，裴注應是很重要的參考資料。

四

本書作爲高等學校歷史系「中國史學名著選」教材的一種。選錄標準，注重下列幾方面：一、三國時最重要的歷史人物，選魏武帝紀、諸葛亮傳、吳主傳等。二、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談到以弱勝強，「弱者先讓一步，後發制人，因而戰勝」，以中國歷史中有名的戰役爲證，曾舉出袁曹官渡之戰、吳魏赤壁之戰、吳蜀彝陵之戰等。爲了幫助高等學校歷史系學生深入學習毛澤東選集，明瞭此三次戰役的詳細情況，所以需要選入記載此三次戰役的有關傳記。官渡之戰，魏武帝紀中記載較詳，而敘述赤壁、彝陵兩次戰役較詳者，則有周瑜傳與陸遜傳，所以也都選入。三、有關曹魏境內施行屯田、興修水利、發展生產者，選峻傳、鄭渾傳、倉慈傳，裴注中引魏略所記皇甫隆、顏斐事，亦屬此類史料。四、在學術思想、文學、科學技術各方面有貢獻之人物，選陳思王植傳、王粲傳（附徐幹等）、鍾會傳（附王弼，裴注引何劭王弼傳）、華佗傳、杜夔傳（裴注引傅玄馬鈞傳）。五、記載少數民族事迹者，選烏丸鮮卑傳、李恢傳、張疑傳（李、張兩傳均記南中少數民族事）、諸葛恪傳（記山越事）。

所選各傳，都是全篇，亦偶有節錄者，如陸遜傳只選到彝陵戰役事，以後則刪去，諸葛